

故宫珍本丛刊

精选整理本丛书

日讲书经解义

清康熙内府刻本
〔清〕库勒纳等撰
平之 标点注释



前清帝师经筵日讲的讲义
清宫学习儒家经典的课本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故宫珍本丛刊》精选整理本丛书·经部

日讲书经解义

清康熙内府刻本
(清)库勒纳等撰
平之标点注释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讲书经解义 / (清) 库勒纳等撰; 平之标点注释.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1.9
(《故宫珍本丛刊》精选整理本丛书)
ISBN 978-7-5443-4010-6

I. ①日… II. ①库… ②平… III. ①尚书—研究
VI. ①K2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1312 号

日讲书经解义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 编: 570216

网 址: <http://www.hncbs.cn>

电 话: 0898-66822380 13976008648

责任编辑: 李升召 熊果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市宏发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3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43-4010-6

定 价: 38 元

序：对儒家的再认识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儒家，什么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或主要特点。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阐述为例：“儒家”是“中国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的学派。”“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的特点是‘以六艺为法’，‘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即宗师孔子，视其言行为最高准则；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经典；提倡仁义，作为行为准则；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均见2009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儒家”条）

儒家自创立至今两千多年来，“尊孔”和“批孔”的争论和斗争一直绵延不断；尤其是自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批林批孔”运动，恐怕是我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受到最严重打击的、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时代。如今，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三十余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中共十七大报告又发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号召，民间更出现了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到书店去看看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影印本和新排本、注释本即可证明）。

二十多年以来，我有幸接触了一些传统文化，粗浅地体会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使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到百余年来以儒家为代表的我国传统文化所受到的种种激烈的批判。现

在看来,那些批判有不少是过分的,甚至是错误的。恰逢海南出版社准备出版《日讲书经解义》等一系列儒家经典,该书责任编辑认为反思那一段历史对今天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我就将平常思考的一些心得体会敷衍成了此文。

在汉武帝之前,儒家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并没有像法家一样,得到过当时政权的重视,甚至还受到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巨大迫害;及至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才和政权开始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绝大多数皇帝都把儒家思想奉为治国安民的法宝。

儒家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之所以享有这么崇高的政治、学术地位,其原因是很好理解的。因为每一位皇帝都希望自己所统治的国家和社会是稳定的、有秩序的,而儒家思想恰恰可以为这一目的服务。儒家“提倡仁义”,“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正是保证一个国家和社会稳定并有秩序的前提和基础。

从反面来看,凡是企图造反推翻当时政权的,首先就必须反对儒家思想。这一点也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如果遵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原则,那还怎么“造反”?太平军就大举焚毁过孔庙和儒家经典。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正式出版过多种《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的小册子,其中介绍了历史上很多反孔的故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阅。

不过,历史上的反孔斗争都是暂时的,一旦推翻了旧皇朝,新皇朝建立后,必然又要回到尊孔的立场上来。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五四运动”前后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却远不止是要批判儒家思想,而是基本上全盘否定了我国传统文化。

胡适先生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写道：“使人明白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后了！（少年爱国的人何不试拿《墨子》‘经上篇’里的三五条几何学界说来比较‘几何原本’？）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

胡适先生还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写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新文化运动”不但全盘否定了传统文化，还提出应废止汉字，废除中医等极端主张，鲁迅先生甚至还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海南出版社近期出版了一本《问孔》的书，该书收入了29篇文章，均是“五四”先贤们当年发表的批孔的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阅。

那么，“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呢？现在有不少文章从各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甚至追溯到是受了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文化领袖福泽谕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我认为，最基本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自清中叶以来，日本逐渐强大，而我国却屡遭外侮，几近亡国。因此，为了救亡图存，迅速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华民族愿意承担一切牺牲，这种共识成为当时那个时代民族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就是必然的了。

如果仅仅是面对外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奇技淫巧，我想，我们的“五四”先贤们不至于会提出全盘否定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张。我国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外族金戈铁马的入侵或骚扰，但在多数情况下都通过厉兵秣马将入侵者赶跑（如汉唐）；尽管有

几次亡国,最终结果却都是入侵民族被同化了,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相对于当时入侵民族的文化来说,中华文化太先进了,太根深叶茂了。“国”虽亡了,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只要文化不被消灭,民族就不会灭亡,国家也就不会灭亡。

可是近现代的入侵者与之前历史上的入侵者不一样,他们都是代表近现代“文明”的国家,这种“文明”不但表现在船坚炮利的科学技术上,更表现在国家政治的民主上。当西方民主国家已经进入全体公民普选国家领导人的时代,我国却还在三拜九叩,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强烈对比的反差,使我国当时那些先知先觉、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先贤们无不感到痛心疾首,自惭形秽。经过对比、反思,他们把我国落后的原因全部归结到传统文化头上,对我国传统文化完全失去了信心,于是就有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提倡全盘西化的主张,于是就有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影响最深远的除了“白话文运动”外,恐怕就是竖起了两面旗帜: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这两面旗帜今天仍有广泛深入的影响,并且对其不乏有一些片面的认识,因此下面有必要对这两位“先生”进行一点粗浅的分析。我不是研究政治学的,也不是研究科学(此处指自然科学)的,所以下面只能从基本常识的层面上进行讨论。如果某种认识或理论在常识层面上都有问题,那就真应当认真加以考虑了。

先说“民主”。

与“民主”相对的概念是“专制”或“独裁”。这两个概念原本专指国家的政治制度,现在这两个概念的应用范围已非常宽泛,还常用于描述管理和领导的方式或作风。大概由于我国人民长期深受专制制度的苦难,现在一般群众都将“民主”看作是

一个绝对的褒义词，而将“专制”看作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认识“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关系呢？下面想模仿邓小平同志阐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那一段名言的句式，来表述二者之间的关系。

民主多一点还是专制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民主方式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民主；专制方式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专制；民主和专制都是政治（管理）手段。

我相信，像这样来表述“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是正确的。其实，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也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作为一种管理手段，都是古已有之，只是在“左”倾思想盛行的时代，才给他们都贴上了“阶级性”的政治标签。

既然“民主”和“专制”只是一种管理方式或手段，因此其本身并没有褒贬好坏的区别。“民主”并不能保证每一次决策都是正确的，“专制”也不一定每一次决策都是错误的；“民主”的决策过程往往效率较低，“专制”的决策过程往往效率较高；“民主”决策的错误往往比较容易得到纠正，“专制”决策的错误往往较难得到纠正。“民主”和“专制”都应该使用在适当的地方，例如，社会的管理，民主的手段应当多一点，而军队的管理，专制的手段必然会多一点。

这儿还想介绍国外关于“民主”研究的一个有趣的成果——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按照我们通常的认识，只要遵守民主投票的规则，总是能够推选出多数人满意的人选或做出多数人满意的决策的。可是阿罗却用严格数理逻辑的推理证明，当至少有三名候选人和两位选民时，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存在能够仅凭个人意愿就决定选举结果的独裁

者,而这个前提又与举行民主投票的出发点是相悖的。该项研究成果获得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关于“民主”,还有一个问题应当指出来。通常人们都把全民普选国家领导人看作是某个国家民主实现程度的标尺,我认为这也有值得探讨的地方。在一个几十万、几百万人口的国家实行普选,与在一个几千万人口、甚至几亿人口的国家实行普选,其操作难度和经济成本(总成本和平均成本)相差恐怕都是很大的,其结果的可信度相差恐怕也是很大的,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成果公布(也许笔者孤陋寡闻)。

下面再说“科学”。

什么是科学?《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科学”条)《辞海》的定义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1999年版《辞海》“科学”条)

“科学”既然只是一个“知识体系”,那么他仅能保证其内部是自洽的,即内部是不自相矛盾的,而不能保证其应用结果是“好”的。事实上,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给人类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常常给人类和大自然带来巨大的危害。

例如滴滴涕,上世纪中叶在预防疟疾、痢疾等人类传染病,以及在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方面发挥过极大的作用;后来发现滴滴涕很难自然降解而在动物体内富集,甚至南极的企鹅血液中也检测出了滴滴涕;到70年代,已基本停止使用。类似这样的科学发明数不胜数,再如现在仍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类塑料制品,风靡全世界的食品添加剂氢化油,等等。

又如核能发电,半个世纪以来核能发电给人类创造的财富,不知道能不能弥补几次重大核灾难给人类带来的经济损失,更

不用说核灾难还给人类生命造成了巨大的摧残。

上面所举事例可清楚表明，“科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确实不能保证其应用结果是“好”的；甚至，有时科研成果的应用所带来的问题比他所解决的问题更多、更严重。尤其糟糕的是，科研成果应用所解决的问题和带来的好处多是当时就能显现出来的，而他所带来的问题或所造成的危害往往要过很多年后才被人们逐步发现。看来，一项科研成果能不能应用、推广，人类应当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以上用了不少篇幅来讨论关于“民主”和“科学”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自“五四运动”前后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我国传统文化受到激烈批判的力量，我认为主要就来自“民主”和“科学”这两位“先生”。直到今天，在很多人心目中，这两位“先生”仍具有某种“神圣”和“绝对”的意义。因此，如果今天我们不指出这两位“先生”的某些局限性，那就难以弘扬以儒家为核心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里应当特别说明一点，本文指出“民主”和“科学”有某种局限性，并不是说“民主”和“科学”在我国已经很先进了，不需要再进一步发展了，而只是说对“民主”和“科学”不应当有盲目崇拜的心理。

目前，我国正在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认为和谐社会包括两方面的“和谐”，一是人与人的和谐，或者说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德先生”属于人与社会和谐的范畴，“赛先生”则属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范畴。从我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儒家更多的是关注人与人的和谐，而道家则更多的是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下面将谈谈今天应当怎样从总体上认识儒家的问题；至于今天应当怎样认识道家的问题，则在今后海南出版社出版道家著作时再说。

儒家文化,或儒家思想在我国已发展了两千多年,早已形成了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汉代董仲舒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再到宋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儒家学说的这种发展脉络,肯定有其内在文化思想上的一致性、逻辑性,可是,我们今天应当一股脑都“弘扬”吗?显然不应当。就是孔子活到今天,也未必会赞同董仲舒和程朱理学的这些观点。看来,我们继承儒家思想,恐怕要回到孔子那里去,正本清源。

孔子生活在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当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数百年征战不已,兵荒马乱,苛政猛于虎,民不聊生。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针对这一动乱的社会状况而提出的一整套治国安民的思想理论体系。然而,当时并没有得到实施;直到三个半世纪后才被汉武帝采纳作为治国理念,之后又逐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深入人心,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儒家”条)。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别的治国理念(如民主和法治),像儒家思想一样,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美地结合起来,在中国这样辽阔的国度里、众多的人口进行了近两千年的实践,成功的实践。

回顾近两百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不是很像两千多年前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吗?面对这一动乱的世界格局,西方发达国家除了热衷于玩“合纵连横”的战略游戏之外,他们最主要的思想理论武器就是民主和法治。然而近两百年过去了,世界局面并没有根本好转,战争和动乱从未停歇;近二十年来,又加上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恐怖活动猖獗,使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不得安宁。即便在那些民主和法制都非常健全的国家内部,抢劫、

杀人、经济犯罪等社会问题也仍然层出不穷。

历史和现实表明，单靠民主和法制是不足以建立和维护一个和谐社会的，本文不拟从理论上来讨论其中的原因，而只拟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民主法治”只是和谐社会应该包含的内容之一。根据儒家思想，“民主法治”属于“形而下”的“器”的范畴，并不能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人们的根本思想基础；相反，属于“形而上”范畴的“仁”、“德”等儒家思想却恰恰堪当此任。

第二，我国法家的兴衰史也能说明这一点。法家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派，其思想核心是改周朝以“礼”治国而为以“法”治国；法家帮助秦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但是秦二世而亡；西汉初年，废除了秦朝的严刑峻法，采用“黄老之学”作为治国指导思想，法家学派逐渐消失，但其法治思想后来被董仲舒等儒家吸收，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正是儒家的这一整套治国理念，从根本上、从总体上维护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两千年的长治久安。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一基本历史事实。

关于弘扬儒家传统文化，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究竟应当弘扬儒家文化中哪些具体内容呢？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一条基本原则：“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因此，上述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还可表述为，在弘扬儒家文化时，究竟应该怎样贯彻这些基本原则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需要写专著来研究讨论的问题，本文就不涉及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应当说明。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前提当然必须对其有一个“全面认识”，而要有“全

面认识”，首先又必须有一套较好的读本。通过比较，我认为北京故宫珍藏的《日讲易经解义》、《日讲书经解义》等一系列儒家经典堪称最佳。这一套书是康熙皇帝“特命”翰林院经筵日讲官“取汉宋以来诸家之说，荟萃折中”撰写而成，以作为“日以进讲”（康熙《御制〈日讲书经解义〉序》中语）的课本。该套书解释精当，刻印精美，且从未见整理出版过，这次海南出版社将其改成简化字横排，并加标点、注释出版，奉献广大读者，应当是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所作的一大贡献。

易 潇

2011年8月于海口

附注 笔者认为《易经》不应算作儒家经典，其理由叙述在海南出版社同时出版的《日讲易经解义》书前《序：〈周易〉是什么书》一文中，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前 言

《尚书》，汉以前称为《书》，“尚”字乃汉代所加（章太炎认为，汉儒以仅一“书”字不能成名，故累加“尚”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择取《书》为五经之一，故其后又称为《书经》。

对于“尚书”这一名称的内涵，一般认为，“书”指的是上古时期一种特殊的记录或文档名称。它形成的年代十分久远，春秋战国时期及之前，王朝巫史之属对帝王政令或国家大事的记录大多称为“书”，大抵相当于后来的皇家卷宗、档案之类。至于“尚”字，各家看法尚存在分歧，主要有三种解释：一为“崇尚、尊崇”之义，言其书所记概为王侯之言论事迹，理应推崇，故称“尚”；二为“尚”通“上”，作“上古、上代”之义；三亦以为“尚”实通“上”，不过应取“君上、主上”之义。三种取义系侧重点不同而已，可谓各有千秋，而细细斟酌，三者又互有联系，难以割裂。盖古人取“尚”为名，三义兼而取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关于《尚书》的成书，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云：“《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所纂，上断于尧，下论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尚书》一书，是孔子对上古之“书”进行精挑细选后编纂而成的一部“书”集（形式与《诗经》相似），选材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尧帝，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跨越了一千多年。至于这一集子中具体各篇章的作者，现已无从考究，如前文所说，大抵为同时期各王朝巫史之属。

《尚书》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即为明主贤臣之道，因此一直以来，在众多儒家经典中，它尤为历代王朝统治者所重视与推崇。从形式上来看，《尚书》包含了六种文体，即：典、谟、训、诰、誓、命（伪“孔安国《尚书》序”）。

“典”即“经典、大典或典范”，主要记录上古贤君的生平重大事迹及君临天下之道，带有浓厚的歌颂性，在《尚书》的几种体裁中地位最为尊显，现存今、古文《尚书》总 58 篇中，仅尧、舜二帝以“典”命名（即《尧典》、《舜典》二篇），于此可见一斑。

“谟”即“谟议、谋议”，多为对明主贤臣共商国是的记录，形式上呈问答式，表现了君臣一起商讨、谋划的情景，以《皋陶谟》为代表。

“训”即“训示、训诫”，多为大臣对君上的训导谏诤之言，表现了一定的警示性，如《伊训》。

“诰”即“诰谕、布诏”，多为君主或顾命大臣对臣民的诰谕之词，表现了一定的约束性和告诫性，如《汤诰》。

“誓”即“誓师”，多为战前主帅鼓舞军心、严肃军纪及申明敌方罪状以正出师之名的言词，表现了一定的号召性和强制性，如《汤誓》。

“命”即“册命、委任”，多为君主任命官员或临终授命之言，表现了一定的嘱望性和期待性，如《顾命》。

今、古文《尚书》58 篇，或直接以之名篇，或名非而实属，皆无出上述六体。

班固《汉书·艺文志》言《尚书》“凡百篇”，那么为什么我们现今所见的通行本《尚书》（如《十三经注疏》本）仅存 58 篇且较原书内容大有出入呢？这是因为从古至今，《尚书》经历了一个相当坎坷而复杂的传承过程。

公元前 213 年，已一统六国的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布《挟书律》，下令“焚书坑儒”，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的《尚书》当然在被焚书目之列。一时间其世所藏之《尚书》，几乎被焚烧殆尽。当此之时，孔子的第八世孙孔鲋和一位叫伏生的儒生都冒着被坑杀的危险，将《尚书》藏进了自家的墙壁之中。公

元前 191 年,汉惠帝刘盈废除《挟书律》,此时年届七十的伏生方敢破壁取出旧时所藏之《尚书》。可惜历经数十年,保存尚完好的仅剩 28 篇。又过了二十多年,到汉文帝时期,朝廷才派时任太常掌故的晁错抄录伏生所存之《尚书》二十八篇,使之重新流布于世。因其书用当时汉代文字书写,故世称《今文尚书》。

公元前 154 年,汉景帝之子鲁共王刘余为扩建宫室而坏孔子旧宅,孔鲋所藏壁中之《尚书》得以重见天日,后来辗转被孔子的第十一世孙孔安国得到。与《今文尚书》不同,这套《尚书》是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所书,所以世称《古文尚书》。更为可贵的是,它比伏生所藏之书保存得更为完好,又多出了十六篇。不过可惜,由于有了《今文尚书》的存在以及其本身文字难以识读等多方面的原因,《古文尚书》并未受到当时朝廷的重视。

公元 311 年,匈奴攻陷洛阳,王室所存伏生《今文尚书》在战火中亡佚,民间至此时也无传本,《今文尚书》竟然就此失传了。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由于没有被汉朝廷确立为官学(王莽篡政时曾立《尚书》,但很快随新朝的覆灭而败落),仅能于民间传习,加之《尚书》本身文句深奥难解,后来也渐渐失传了。

东晋元帝时期(公元 317—322 年),豫章内史梅賾向朝廷进献了一部《孔传古文尚书》,共 58 篇,号称是孔安国当年整理校注并为之作序的本子,由魏末晋初的学问家郑冲传下来的。这部《尚书》一经进献,便被朝廷奉为正统,并传承至今。但其间经过宋元明清几代学者的考辨,已证明其中很多篇章系后人所伪造,现罗列如下:

大禹谟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诰 汤诰 伊训 太甲
(三篇) 咸有一德 说命(三篇) 泰誓(三篇)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周官 君陈 毕命 君牙 冏命 蔡仲之命

虽然这些篇章是后人伪造,但如果就此盖棺定论,认为其毫

无价值而对其不屑一顾，那就大错特错了。黄侃先生曾说过：“伪《古文尚书》，一文字古，二文采高，三取材广博，四训诂不谬，故在今日言之，仍可作‘准康成’观也。”（《量守庐论学札记》）黄侃先生所言，可谓至情至理。这大概也是历代学者对伪《古文尚书》辨而不删的情由所在。今天看伪《古文尚书》，就像唐三彩中有宋窑瓷充数，在今天也是珍宝了。

《日讲书经解义》是清康熙皇帝召集朝廷中的国学大儒们编写的，采用的底本源于梅賾的《孔传古文尚书》，总共有 58 篇。这本书的解义部分，对《尚书》分析得很透彻，深刻体现了《尚书》的宗旨，不局限在单个词的解释上，而注重疏通《尚书》的脉络，并且加以阐释。《尚书》语言晦涩、断句困难，一般人难以读懂。而我们读《日讲书经解义》，常常会感到原来扞格难通的疑问，顿时涣然冰释，茅塞顿开。